

『后汉书』

文学初探

HOUHANSHU W

HUTAN

钟书

有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『后汉书』

文学初探

HOZHANSHU WENXUECHUTAN

钟书林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后汉书》文学初探/钟书林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0. 6
ISBN 978-7-5004-8620-6

I. ①后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后汉书-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 2
②K234. 204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0249 号

责任编辑 郭晓鸿(guoxiaohong149@163.com)

特邀编辑 王冬梅

责任校对 张玉霞

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

技术编辑 戴 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 传 真 010—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8.5 插 页 2

字 数 295 千字

定 价 3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第一读者的感受

魏耕原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十三“两汉风俗”条，对东汉所论尤为深切：“汉自孝武表章《六经》之后，师儒虽盛，而大义未明，故新莽居摄，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。光武有鉴于此，故崇节义，敦厉名实。所举用者，莫非经明行修之人，而风俗为之一变。至其末造，朝政昏浊，国事日非，而党锢之流，独行之辈，依仁蹈义，舍命不渝，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’。三代以下风俗之美，无尚于东京者。”东汉以政治的昏暗著称于史，顾氏拨开昏浊，而对“党锢”、“独行”之士人，推波助澜而形成的不可阻止与扭曲的世风，极加推美誉扬，确能醒人心目。此言二者之相反，又言世风对政权之维系：“范曄之论，以为‘自桓、灵之间，君道秕僻，朝纲日陵，国隙屡启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审其崩离；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，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。’‘所以倾而未颠，决而未溃，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’可谓知言也。”由此可见，顾氏之论，实是对范曄《后汉书》史论的抉发，亦是心悦诚服之首肯。

较之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》三史，范书自具个性，不仅著述一代之史，意在“正一代得失”，亦可作一代思想史观。在艳称的“前四史”中独呈一道亮丽的风采。同样可知，范书文字的精彩未将在将相传，似乎聚集于他所独辟的《党锢》、《独行》、《逸民》传中。他还特意新辟《宦者》、《文苑》两大类传，前者为东汉症结，后者则揭示了文学将走向自觉时代

的思潮趋势。而《方术列传》则展示道教萌发与谶纬盛行的蓬勃之势。还有《列女传》为女性专设一人物画廊。以上均为早于范书的前三史所无，开后世之法门。

范晔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说“常耻作文士”，这实为善文者的自信，近似扬雄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的用意。这从下面的话可看出来：“常谓情志所托，故当以意为主，以文传意。以意为主，则其旨必见；以文传意，则其词不流。然后抽其芬芳，振其金石耳。此中情性旨趣，千条百品，屈曲有成理。”这在以词为主的六朝真是空谷足音，高屋建瓴之论。他的“耻作文士”，实是对当时文风的不满：“文患其事尽于形，情急于藻，义牵其旨，韵移其意。虽时有能者，大较多不免此累，政可类工巧图绩，竟不得也。”观乎此，即知范史之精神所在。

范史有两大闪光之处，一是合传与类传，二是序、论、赞。对于前者，他认为“既造《后汉》，转得统绪。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，殆少可意者”，范史撰于18家后汉史之后，学如积薪，后出转精，必然之理。故又言：“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无例，不可甲乙辨”，“博赡不可及之，整理未必愧耳”。对于后者，以为班书“后赞于理近无所得，唯志可推耳”，故又“称情狂言”：“吾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约其词句。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《六夷》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。”此言其论。至于赞，则言：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，奇变无穷，同合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”以今观之，其序、论似更出彩。《文选》选录《皇后纪论》、《二十八将论》、《宦者传论》、《逸民传论》，以及《光武论赞》，则范氏自评不为虚妄。

刘宋在南朝可算个张扬自信的时代。书家张融对君主有言：不恨臣无二王法，恨二王而无臣法；诗文亦有健拔者，元嘉之雄谢灵运，遒劲轩翥者如鲍照，均出其时。所以范晔谓己著“故应有赏音者。纪、传例为举其大略耳，诸细意甚多。自古体大思精，未有此也。”前四史的定位，可算是对其“狂言”的认同。

有鉴于此，故应看重范书。加上文学研究往往重诗轻文，所以当钟书

林同好读博，从我读书研究伊始，就萌生此意。

钟君为人谦谨，思敏而向学，从我读硕时就对《世说新语》下过细读之功，作过不少札记。当商定博士论文选题时，即意在《世说》，可谓情有独钟。范书白文，字数不下百万，要在通常完成博士开课学业与科研论文规定“任务”的几篇核心刊物论文后所剩一年内，投入一部大书研究，确属一大难题，而且中文专业的课堂向来不专讲范书。然治学就重弃轻，取大去小，属于向上一路。且《世说》时贤论著甚夥，要独辟一径，亦非易事。范书时下备受寂寞，从文学着眼者寥若晨星，这正是“于无佛处称尊”的好去处。我便千方百计怂恿，竭力鼓动。他处事谨慎，经过半年还要多的不知多少次讨论，这也是他急读范书的时候，终于铁了心，取径于此。

就在这时，他唯一至亲——慈母突然见背，丧亲之恸，难以述言。他是面对慈亲遗容完成毕业论文的。悲痛化为力量，这或许是最好的回报。那时他还是西安一所高校文学学院的教师，每周几节课自是难免。人憔悴了，消瘦了，论文终于成型了。

撰写前，我强调对结构与序论要下工夫，诸如序论中虚词的用意，要下些工夫，要对刘知几《史通》，以及赵翼、钱大昕、王鸣盛著作留心，若有余力要翻翻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，至于李景星《后汉书评议》则最为管用。清人学术笔记也不要放过。至于行文风格，修辞运用也都有要求。还有什么苛求，现在也想不起来，不知给钟君加了多少负荷。

他真是鼓足了力气，拿出来五十多万字的论文，全面展开讨论，诸如时代风气、思想用意、结构体系、叙事方式、写人艺术、语言风格、论赞的文学风采，以及与《三国志》的比较，还有文学地位和影响。其中结构、叙事、语言分析三章，最能见到作者用心所至。论赞部分，他说没有写好。依我看，其中的虚词的运用，向无人涉及，这已很不容易了。他的研究是从文学出发的，前人多于史学用功，故多少带有筌路蓝缕的性质。论文涉及范围甚广，不少地方讨论得很细致，时遇精彩处，让人欣然会心。比如言及袁绍作战一节，就颇有识眼。对《范滂传》这样的名作，论

析亦见精读深思的功力。

作为第一读者，我读了首章，觉得先要再通读原著一遍。费时近月，并有圈画旁批，把它交给作者翻阅，以资思考修改。然后对其余各章详读，详批，目的以臻更好。然后详细交流了感受并给出修改意见。作者果然不负所望，花力气修润、改动、调整、删补。故在外盲审时，五位专家，赫然获得四优，赞语有加。在答辩会上得到一致好评，主席詹福瑞先生更是热心支持。

我们学院在推荐优秀博士论文时，经过筛选，其作被列为两篇之一。学术为天下公器，时下学界尽管有许多干扰，然学人心中有眼，读者自有公论。作者毕业已快两年了，又依据外审和答辩会上的意见，对论文作了不少修改。最近将要出版，因原文长，内容又稍各自有侧重，故分作两部，一曰《〈后汉书〉文学初探》，二曰《范曄之人格与风格》。作为第一读者，作者要我说几句话，师生之谊，辞让不得。只好强作解人，以言其文始末，以及其中甘苦。就在此前，作者一篇考据论文，又为《文学遗产》将刊用。去年春申报的国家项目，是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，又一举成功。近三年来又连续获得省教育厅与西安市几种级别性的奖项。这也说明用心人，好事连绵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要求在读博士必须发表核心论文数篇，实在不见得科学。即就是无此，埋头读书三年，拿出数十万字论文，也非易事。他们多是30岁不到的由学生到学生的博士生。而文科需要积累，至于研究，更需要磨炼，这要时间。复旦大学一毕业多年的博士说，文科博士毕业没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，恐怕不会有成。这是实话。总之，治学无论老少，都松懈不得。愿与作者共勉！

拉杂言之，不觉已长，聊且以为序。

2009年3月

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

目 录

序	魏耕原 (1)
绪论	(1)
一 选题的缘由	(1)
二 《后汉书》研究述略	(2)
第一章 东汉社会风貌与范晔《后汉书》的创作	(13)
第一节 东汉社会风气概况	(14)
一 东汉的政治与官场风气	(14)
二 东汉的儒学及其黜纬之风	(21)
三 东汉的党锢之祸与清谈、隐逸诸风气	(24)
第二节 晋宋的史学风气与范晔《后汉书》	(31)
一 东汉史的编撰	(31)
二 范晔《后汉书》的创作动机	(34)
第二章 “正一代得失”的思想体系	(37)
第一节 “正一代得失”的提出	(37)
第二节 “正一代得失”的内涵	(40)



一 女主贪权	(40)
二 宦官的渐微之祸	(41)
三 外戚乱政	(43)
四 兴亡系乎谶纬	(45)
五 戎狄之患及征伐边远的得失	(47)
 第三章 《后汉书》的结构编撰	(51)
第一节 东汉国史四期编撰	(51)
一 班固与《世祖本纪》	(52)
二 刘珍和《东观汉记》	(54)
三 伏无忌等续修《东观汉记》及蔡邕的十意	(59)
第二节 《后汉书》的总体框架	(61)
一 《后汉书》的结构、体例与东汉国史四期编撰之关系	(62)
二 《后汉书》总体框架的缺憾与东汉国史编撰之关系	(68)
第三节 《后汉书》的结构编次	(71)
一 对《后汉书》结构编次的评价	(71)
二 结构编次的特征及其成因	(74)
第四节 《后汉书》人物传记的结构	(80)
一 人物传记的结构特征	(81)
二 附传法	(91)
 第四章 《后汉书》的叙事特征	(101)
第一节 《后汉书》的叙事手法	(101)
一 文眼法	(102)
二 伏应法	(107)
三 旁衬法	(110)
四 虚实法	(113)
五 缓急法	(116)

六 盈亏法	(120)
七 互见法	(123)
八 獭尾法	(128)
九 目人法	(133)
十 一多法	(135)
第二节 《后汉书》叙事的重复与雷同	(137)
一 代死母题与孝女故事的重复叙说	(137)
二 循吏业绩的雷同叙述	(141)
三 忠义死节的悲歌不断重演	(144)
四 因果报应的反复叙说	(149)
第三节 叙事重复雷同的成因探析	(152)
一 范曄的佛教思想与代死母题的重复	(153)
二 《史记》的叙事传统和《后汉书》因果叙事的重复雷同	(165)
三 范曄有意奖崇儒学与《后汉书》的重复叙事	(166)
第五章 《后汉书》语言的美学风格	(170)
第一节 骈俪风气中的《后汉书》语言	(170)
一 骈散相济	(170)
二 华赡与铺陈	(173)
三 隐秀温润	(181)
第二节 语言的回环往复	(188)
一 “不”字的复沓	(188)
二 因果语词的旋律	(194)
三 语句的连用与反复	(202)
第三节 语言的简疏之美	(208)
一 简疏之美的提出及其接受	(208)
二 简疏之美的表现及其他	(209)
第四节 《后汉书》的虚词及其他	(222)



一 虚词的运用	(223)
二 语言的古趣之美	(231)
三 语言的狠重之美	(234)
四 对话语言	(237)
第五节 《后汉书》的成语、谚语	(242)
一 《后汉书》的成语	(242)
二 《后汉书》的谚语	(246)
第六节 《后汉书》语词训诂、修辞专论	(253)
一 《后汉书》语词考释	(253)
二 《后汉书》雅词考释	(258)
三 《后汉书》中的称呼语	(263)
余论 《后汉书》的文学地位和影响	(276)
一 《后汉书》的文学地位	(276)
二 《后汉书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	(279)
后记	(283)

绪论

一 选题的缘由

文学史的研究，总是会因为受到时代的影响或个体的约束，存在一定的薄弱区或空白点。而我们在看文学史的时候，会突然看到某一种文体或文学思想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出现停滞、空白现象，也会看到某种文体或文学思想的突然出现，并且很快地引领时代潮流。文学史的研究，大多关注的只是文学显性现象，而对于文学发展的潜流和隐性现象，往往没有给予足够重视，甚或是疏忽了，丝毫没有觉察到它。

任何一种文体或文学思想的突然出现、停滞或消失，都会受到一定隐性因素的影响。譬如说，“建安风骨”为什么会在三国时候突然出现，而在西晋以后又迅速地消亡，而到了唐代，又会在陈子昂那儿提起。它的出现、消亡以及再次被提起，只是现在的文学史中所能见到的显性现象，那么在其他历史时期，它是否以文学的潜流形式，一直在地下发展着呢？这样，我们就要了解它在三国以前，在六朝时期，作为文学潜流的发展状态。我们认为，“建安风骨”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即是东汉儒学士林的精神风骨。东汉儒学之士尊崇节义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风貌，直接从社会文化的胚胎中催生了文学领域里的这朵奇葩。其中影响最巨的是桓、灵之际的党人精神，他们与宦官斗争的那股慷慨悲壮的人格“风骨”，直接培育了“建安风骨”。这些党人当时无暇从事或藐视文学创作，所以他们的“风

骨”更多地投入到了政治当中。当党锢之祸结束的时候，从血腥的屠刀下侥幸逃脱过来的士人们，面对着千疮百孔的朝局，他们的政治热情很快地衰退。因而这个时候，有人清谈了，有人归隐了，也有人投身到了文学领域。再加上原来党人精神的影响，“建安风骨”便自然耀眼于此时的文坛。西晋以后到陈子昂时期，刘宋范曄《后汉书》之风骨是承继建安风骨的一股最大潜流，长期以来不易为人察觉。所以，考察东汉儒林士风，考察范曄及其《后汉书》，成为我们理解“建安风骨”嬗变的两个重要枢纽。为了更好地梳理“建安风骨”这一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，《后汉书》的审视和研读成为我们的第一个驿站。这是从文学史的大处考虑，我们选题《后汉书》的原因。

小处的考虑，是《后汉书》自身的原因。从篇幅数量上来说，《后汉书》在“前四史”中是部头最大的，仅范曄《后汉书》90卷，字数就达到73万多，加上司马彪的“志”30卷，共有83万多字。但是，《后汉书》作为“前四史”之一，其文学价值远没有其他三家那么受重视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文学价值在伯仲之间，有“史学双璧”或“双子星座”之称；《三国志》因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，其文学价值也受到重视。《后汉书》因为范曄谋反被诛的缘故，遭到不少学人的轻视和非议。自北宋以降，它就已经蒙上“恶书”的阴影。《后汉书》虽然早在唐代，已经取代《东观汉记》而跻身“前三史”之列，并有唐章怀太子李贤为之作注，但在整个史传文学的长河中，地位并不显赫，尤其到了现当代，更是每况愈下。相较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《后汉书》的研究要远为逊色。

因此，本书主要以范曄《后汉书》为研究文本，对其文学成就进行解读和探究。

二 《后汉书》研究述略

1. 古代《后汉书》研究的简单勾勒

从刘宋到清末，《后汉书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训诂、史实考据、

补遗辑佚等方面。

隋唐之前,《后汉书》地位处于逐步上升时期。范曄仓皇伏诛,他生平所撰写的十志,本来已经“搜次垂毕”,却被谢俨“悉蜡以封车”(《宋书·谢俨传》),引为一代之恨。一时之间,范曄《后汉书》也成为禁区,无人敢问津。直到梁代,刘昭取司马彪《续汉书》旧志,补范书之不足,注范书一百二十五卷。从此,《后汉书》以较为完备的面貌开始流传。正是因为刘昭的功劳,南北朝后期,对范曄《后汉书》音义的研究也进入了黄金阶段。有文献可证的有:梁代韦阐《后汉书音》二卷、后魏刘芳《后汉书音》一卷、韦机《后汉书音义》二十七卷、臧竞《范汉音训》三卷、萧该《范汉音》三卷。这些音训的工作,使《后汉书》日益普及,广泛传播,终于在唐代时跻身“前三史”之列,取代了《东观汉记》。

唐代是《后汉书》研究发展的第一个时期。引人注目的是《后汉书》作为“前三史”地位的确定和李贤《后汉书》注的问世。李贤注的通行,是《后汉书》传播史上的特大盛事。与此同时,刘知几《史通》从史学的角度,对《后汉书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。虽然有些评价和见解不无可商榷之处,但至今对学人仍颇有启发。如他称“范曄理切而多功”、“范曄之删后汉也,简而且周,疏而不漏,盖云备矣”,又说“范曄独采众书,裁成汉典。观其所取,颇有奇工。至于《方术》篇及诸蛮夷传,乃录王乔、左慈、稟君、盘瓠言,唯迂诞事多诡越,可谓美玉之瑕、白圭之玷,惜哉!无是可也”^①。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,《后汉书》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一起被称为“三史”,列入考试的科目。并且这种风气传播到了当时的朝鲜半岛。

从北宋时起,对《后汉书》开始有了否定性的评价。宋神宗厌恶范曄的人品,曾经试图命人改作《后汉书》,所以后来的很多士大夫就承继了神宗的这种好恶。如洪迈说“曄之夸诩……至以为过班固,固岂可过哉,

^① (唐)刘知几著,(清)浦起龙释:《史通通释》卷4《序例》、卷8《书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,第88、230页。

晔所著了无可取”^①，王应麟载“翟公巽谓范蔚宗书冗陋，别作《东汉通史》”^②。

但在否定的同时也有不少肯定的。如叶适说：“至后汉始有史官，《东观汉记》前后相承，范晔所以能述史于二百年之后，由有诸家旧书也。然东汉虽有汉记，而当时风俗之质则不如前汉，而所载多溢词。又胡广、蔡邕父子竟不能成书，故一代典章，终以放失。范晔类次齐整，用律精深，但见识有限，体致局弱，为可恨耳。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，缕贴绮绣以就篇帙，而自谓‘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’，盖宋齐以来文字，自应如此，不足怪也。”^③

综观整个宋代，对《后汉书》的评价，尽管是毁誉参半，但那些否定性评价，对后世《后汉书》的传播却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。

金、元习气多承自宋代，对《后汉书》的评价亦是如此。金代以王若虚为代表，其《滹南集》说：“老苏评范晔之失，谓不当概董宣于酷吏，概郑众、吕强于宦者，概蔡琰于列女，其论董宣、蔡琰是矣。若郑众、吕强虽有可嘉，岂可改宦者之目乎？”又说：“范晔史论云：‘义重于生，舍生可也；生重于义，全生可也。’夫义当生则生义，当死则死。义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对立之物也，岂有时而轻重哉？义重于生，已为语病，又可谓生重于义乎？虽然，此自汉以来学者之所共蔽。晔也叛人，何足以知之。”^④可见王若虚对范晔的评价，没有脱出宋人的窠臼，仍然带有较强的主观偏见。

在元代，刘因的观点最具代表性。他说：“性无不统心，无不宰气，无不充人，以是而生，故材无不全矣。其或不全，非材之罪也。学术之

①（宋）洪迈著，孔凡礼点校：《容斋随笔》卷15“范晔作史”条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193页。

②（宋）王应麟著，孙通海校点：《困学纪闻》卷13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63页。

③（宋）叶适：《习学记言序目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370页。

④（金）王若虚：《滹南集》卷30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差，品节之素，异端之害，惑之也。……东汉史成于范曄，其人诡异好奇，故其书似之。然论赞情状有时亚于迁、固，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，诸序论往往不减《过秦》，则比拟太过。”^①

要之，这些宋、元理学家，着眼的是“文如其人”，着眼的是范曄曾经谋反的现实，所以，他们对《后汉书》作出这样的评价，势在必然。

明代以后，世人对《后汉书》的评价渐高，这与明代对史家之文的推崇有很大关系。如张志淳说：“范曄《后汉书》盖出为宣城太守，不得志，乃删众家《后汉书》为之。论者讥其赞辞佻巧，又创为《皇后纪》，复采王乔等诡事入列传。朱子又非其不录《胡笳十八拍》，而载《悲愤》二诗。盖曄极无行义之人也，其传琰之初意，已自有在，而何能深探哀怨发中之旨哉？只如边韶之传，竟何所关系，试使七家旧列于《汉书》，曄亦当删去之，而载之至今。人皆喜谈以为故事，殊不可晓。”^②他不赞成《后汉书》“赞辞佻巧”的说法，也不同意朱熹称范曄是“极无行义之人”的评价，认为范曄传写蔡琰等传自有其“精意深旨”。从这些可以看出，张志淳开始了对宋人研究的反思。这种反思，是明代研究《后汉书》的一个鲜明特征。

明代《后汉书》的文学研究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景观。陶宗仪《说郛》^③中载有很多史料，如卷22载廖明略语“范曄之文，秀整温绎”，对《后汉书》文采，作出较好的评价。钟惺的《史怀》^④，可以说是一部研究《后汉书》的力作，他的许多看法，直到今天仍为学者所重。沈国元的《二十一史论赞》^⑤，辑录了大量学者对《后汉书》论赞的评价，其中不少是对其文学特色的点评。

① 李修生主编：《全元文》卷464“刘因三”，“叙学”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88页。

② （明）张志淳：《南园漫录》卷8，丛书集成续编本。

③ （元末明初）陶宗仪：《说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。

④ （明）钟惺：《史怀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⑤ （明）沈国元辑：《二十一史论赞》卷4，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大来堂刻本。

此外，明代中后期以后，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家喻户晓，《三国志》也随之走俏，开始有了对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优劣高下的争论。

清代，《后汉书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遇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康熙皇帝对《后汉书》的推崇。他多次称道范曄《后汉书》，如说：“《皇后纪序》引《周礼》、两汉间事，又历陈监戒之言，辞婉而义深。有国家者当与《尚书》‘牝鸡无晨’之句参看，庶不至椒房近戚之累欤？《吴盖陈臧传论》文俚而严，意以偃兵为重。《中兴二十八将论》光武以封爵待功臣，而不责以吏事，故保全者多，文独扼此发议。《孔融传论》文有严毅之气，肃穆之容。《周黄徐姜申屠传序》自变量事以成文，亦是一格。《党锢列传序论》叙党人始末详尽，从四豪任侠立论，其源起于气矜，其弊成于罗织，可谓论世之识。《宦者传序》东汉之末宦寺流，已极斯文，能痛切言之；《逸民传序论》叙述洁己之士，文亦简裕。”又说：“予读范曄《荀彧传》，而叹曄之有史材而无史识也。夫史材非难，史识为难。自迁、固即已不免此病，而何怪乎曄哉？”^①当然，也不乏否定《后汉书》者，如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^②、牛运震《读史纠谬》^③等，已经将《后汉书》贬得很低，而对《三国志》特别青睐，因而这个时期的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优劣之争，显得格外激烈。

清代的三大史学研究家赵翼、钱大昕、王鸣盛，对《后汉书》的研究，也都各有建树。特别是王鸣盛，他对《后汉书》的偏爱和推崇，到了不允许别人批评的地步。他讥讽重修后汉史的翟公巽说：“史裁如范，千古能有几人，公巽何物，妄加讥贬重修”，又说：“王氏妄载之何为，无识甚矣”，不但嘲弄翟公巽，而且连写《困学纪闻》记载这件事的王应麟也遭到了他的詈骂。他提出的范书“表死节，褒正直，而叙杀身之为美”^④，

①（清）爱新觉罗·玄烨：《御制文集》第三集卷33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②（清）何焯著，崔维高点校：《义门读书记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③（清）牛运震：《读史纠谬》，《二十二史考论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。

④（清）王鸣盛著，黄曙辉点校：《十七史商榷》卷36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55页。